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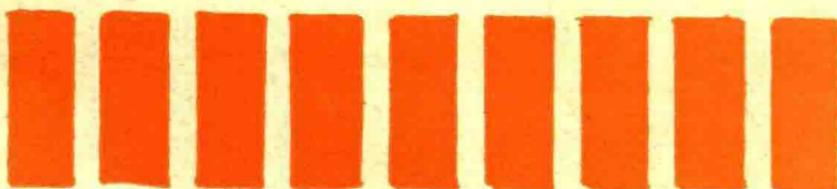
社会学专业教学用书

中国社会学史资料选编

— 下 册 —

(校 内 使 用)

陈树德 许妙发



上海大学文学院

目 录

(下 册)

陈序经

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 (256)

吴文藻

《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导言 (265)

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 (275)

社会学丛刊总序 (283)

陈翰笙

《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农村生产力》编者序 (287)

冯和法

《农村社会学大纲》自评 (288)

评言心哲先生著《农村社会学概论》 (295)

王新命等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306)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引言 (311)

我们的两大难处 (312)

费孝通

《花篮瑶社会组织》编后记 (325)

现代社会学 (330)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代序) (336)

《乡土中国》后记 (350)

吴景超

世界上的四种国家 (358)

多福多寿多男子	(366)
阶级论在社会学中的地位	(369)
李达	
布尔乔亚社会学之批判	(370)
张闻天	
出发归来记	(393)
田汝康	
《芒市边民的摆》导言	(415)
王亚南	
关于社会学的应用	(421)
李树青	
社会学与社会制度	(427)
林耀华	
现代人类学的趋势	(433)
附录	
一、东南社会学会纪事	(442)
二、中国社会学社成立会记	(444)
三、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记事	(446)
四、中国社会学社社章	(450)
五、中国社会学社第二届年会纪事	(452)
六、中国社会学社第六届年会纪录	(460)
七、中国社会学社纪事	(464)
八、社会调查所之历史与工作概况	(470)
九、燕大社会学系近况调查	(472)
十、燕京大学社会学面面观	(476)
十一、国内各大学社会学课程调查	(482)
十二、中国社会学重要文献分类简表	(491)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

晏阳初

一 平教运动的发端

这次“乡村建设协进会”开会的价值，非常重大。昨天听见梁先生关于接近民间工作的报告，及江先生关于徐公桥工作的详述，以及李石曾先生富于科学的研究精神，都是我们从事农村工作的借镜和参考。

近年来最使我兴奋的一件事，就是现在国内各界，大家都能亲身埋首去从事农村工作，不问他们工作范围的大小，只要大家一边做一边学，将来都是复兴民族的功臣，也就是建立国家基础的绝大贡献。但是农村工作，需要时间，彼此务须切磋砥砺，各把经验得失，互相研讨，这是这次开会最大的意义。

平教运动的发端，是在欧战时候，当时各国招募华工，到欧洲工作。兄弟从美国到法国，办理华工教育，目睹华工不识字之痛苦，从那时，得了一些经验，同时联想到国内一般不识字文盲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重大，所以回国以后，就从事提倡识字运动。但是在工作经验中相信中国大部分的文盲，不在都市而在农村，中国是以农立国，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农村是中国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人民的着落地，要想普及中国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里去。所以同人才决定到定县去工作。

在定县乡村办平民教育，我们觉得仅教农民认识文字，

取得求知识工具而不能使他们有用这套工具的机会，对于农民是没有直接效用的。所以从那时候起，我们更进一步觉悟，在乡村办教育若不去干建设工作，是没有用的，换句话说，在农村办教育，固然是重要的，可是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的建设不可，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

我们在定县的工作，可分为两个段落。一个 是准备时期，一个 是集中实验时期。从民国十五年冬到十九年秋，算是准备时期，在这时期里，我们的工作，可分为农业教育，农民研究，和农村调查三方面。教育方面，专注重平民学校的实验与推广。生计教育方面，偏重普及农业科学的工作。社会调查分普通调查，农业调查，及农业经济调查，尤注重在一般的考察。前两年的工作，同人的饮食起居，定县人民不能充分了解，颇感困难。但这正是准备时期应有的情形，及工作上必经的阶段，后来因同人的工作精神，感动农民，才逐渐地取得人民的信仰，同时地方政府与士绅也都了解到平校的重要，所以准备时期的工作，才能比较的顺利进行。

经过这四年准备时期，我们决定大家都到定县去，对着全县去工作。我们觉得中国的一个县分，实在是一个社会生活的单位，不仅是行政区域的单位。中国的国家，是由一千九百多个县分构成的。一县就是一个广义的共同生活区域，为若干隶属的共同生活区所构成，是我们从事乡村工作实行县单位实验的最好单位区域。我们今以定县为一个大的活的研究室，是要每种问题，实际参加人民生活，并不是用政治力量，来建设所谓模范县，也不是如慈善机关来定县施舍教育，是来在人民生活上研究实验，将以研究的得失经验，得出一个方案，贡献于国家社会。

二 农村建设四大问题

在定县，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农村问题，是千头万绪。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又认定了四种问题，是比较基本的。这四大基本问题，可以用四个字来代表他，所谓愚，贫，弱，私。

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所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

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

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是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

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在这几个缺点之下，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要根本解决这四个基本问题，我们便要从事四种教育工作，这四种教育是：一、文艺教育，二、生计教育，三、卫生教育，四、公民教育。同时这四大教育，也就是我们从十九年秋季起，决定集中我们人力财力在定县作一个彻底的，集中的，整个的县单位实验的内容。

三 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

关于文艺教育的工作，是要谋解决愚的问题的。从文字及艺术教育着手。使人民认识基本文字，得到求知识的工

具，以为接受一切建设事务的准备。凡关于文字研究，开办学校，教材的编制，教具教学方法的研究，以及于乡村教育制度的确立，都是属于这部分工作范围以内的。

我们工作的原则是只从事研究与实验，设立实验学校，表演学校，将研究结果，贡献给地方当局，让他们去推广，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这种研究出来的文艺教育，是要普遍适用于全国其他各县的，必须合乎农村经济财力的，因为在穷中国办穷教育，必须要用穷的办法。

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自信已有相当成功，我们打算在今年以内，能够做到把全县的青年文盲除净，目的是在发现并造成除文盲整套的应用学术。

农民有了基本文字知识，我们把他们组织起来，就是平民学校毕业学生所组织的各村同学会，也就是属于我们社会式教育工作之一。这些同学会，是农村优秀青年组成的，他们是农村建设的中心分子，他们有了知识，有了组织，去做建设工作，是容易推动的。

关于生计教育工作，是要谋解决穷的问题的。我们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村工业各方面着手。在农业生产方面：注意到选种，园艺，畜牧各部分工作。应用农业科学，提高生产，使农民在农事方面，能接受最低限度的农业科学。在农村经济方面：利用合作方式教育农民，组织合作社，自助社等。使农民在破产的农村经济状况下，能得到相当的补救办法。在农村工艺方面：除改良农民手工业外，并提倡其他副业，以充裕其经济生产能力。

关于卫生教育工作，是要谋解决弱的问题的。我们注重大众卫生与健康，及科学医药之设施。使农民在他们的经济状况之下，有得到科学治疗的机会，能保持他们最低限度的

健康。确立一个乡村保健制度，由村而区而县成一个有系统的，整个的县单位保健组织。全县有一个保健院，每区有一个保健所，每村有一个保健员，保健员就是平民学校毕业生同学会会员，受过短期训练的，他们带着保健箱子，到村里各家去施诊，使各村农民，都有受到科学医药治疗的机会。

关于公民教育的工作，是要谋解决私的问题的。我们激起人民的道德观念，施以良好的公民训练，使他们有公共心，团结力，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政治道德，以立地方自治的基础。我们办教育，固然要注意文艺，生计，卫生，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根本的根本，就是人与人的问题，大家要都是自私自利，国家就根本不能有办法，绝没有复兴的希望。所以我们办公民教育，用家庭方式的教育，在家庭每个分子里，施以公民道德的训练，使每一个分子，了解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发扬他们公共心的观念。其次我们在这国难严重的局面下，还要注意唤醒人民民族意识，把历代伟大人物，可歌可泣的故事，用通俗的文字写出来，用图画画出来，激励农民的民族意识。

今天兄弟说话很多，可是兄弟并不能说是在演讲，因为是在一家人面前说话，诸位都有同样的抱负，我们都是自家兄弟，应当彼此切磋琢磨，我相信今天在会的诸君都是新文化的同志。

(本文选自一九三四年中华书店版《乡村建设实验》第一集)

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

陈序经

从《独立评论》第十一号登载邱椿先生讨论关于教育崩溃的一个责任问题的通讯里，我们找出下面一段话：

中国新的教育，最初抄袭日本，……后来模仿法国，……近三四年，他们都觉悟纯粹抄袭的错误，而提倡中国化的教育。关于这类文字，已发表了好多，差不多成为烂调了。

新教育的中国化，的确是数年来一般教育家的时兴口号，而且是国内一种很普遍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动机，也许会象邱椿先生所说，是由于他们觉悟纯粹抄袭的错误，然其结果，——据我个人的意见，——是很有中国教育再趋向于复古运动的危险。

原来新教育，既象从事这种运动的人们所说，不是中国固有的教育，而是从外面输运过来的东西，那么中国固有的教育，当然是旧的教育。旧的教育，是旧时代的产儿。新的教育，是新时代的产儿。要是新的时代是要有新的教育，那么新的时代的中国，也要有新的教育。换句话来说，就是中国的教育的新时代化，或是现代化。

除非我们把这个“中国化”的中国，叫做旧的中国，那么“新的”教育这回事，是无从发生的。因为使中国而新了，则中国变为现代化的中国，并非现代的中国化。同样，使中国

的教育而新了，那是中国的教育的新化，或现代化，并非新教育的中国化。所以把中国和新教育来相提并论而要新教育的中国化，显然是想把没有经过现代化的中国，来化新的教育。

但是所谓没有经过现代化的中国，不外是旧的中国。旧的中国，是旧时代的产儿。从新的时代或现代看去，旧的中国，若不是落后的中国，至少也是“古董”的中国。因为她若不是落后或古董的中国，他必定是适合现代的中国。适合现代的中国，就是新的中国。要是整个中国是新了，是现代化了，那么教育也必定是现代化了，也是新了。同时，这一个中国是用不着现代化的，而这一种教育，也用不着新化，更没有所谓中国化的可能。所以要使新教育中国化，其结果若不是新教育的退后化，至少也有新教育的古董化的危险。

既是古董，必不能适合时代。既是新的，必非古董。新教育的中国化这句话，本来是自相矛盾的。新教育既不能而且不应该退后化，古董化，——中国化，而所谓新教育的中国化，又恐怕是挂起新教育的招牌，骨子里还是以前屡屡发现的复返旧的教育的主张。而所谓复返旧的教育的主张，就是复古运动。

明明白白是复古运动，偏偏又要加上一个“新”字，这简直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故智。一方面挂起一个新教育的招牌，来号召一般所谓喜欢于新的人。一方面又挂起“中国化”的招牌，来笼络一般的留恋于旧的人。在这青黄不接，新旧过渡的时代，一般所谓喜欢于新的人，既看不出这个运动是复古，而一般留恋于旧的人，当然是快快活活的以为温故知“新”，吾道而西。为了这个原故，怪不得所谓新教育的中国化的运动，能够这么行时。怪不得关于这类文字的发表，多

到要成烂调。

我们忍不住这种似是而非，而最易迎合一般中国人的心
理而有开倒车的危险的言论，因在这里稍事批评。

二

所谓新教育的中国化的最大理由，大约不外以为专从西
洋贩来的教育，总不免有了不合于中国的国情和需要的地
方。假使能合中国的需要和国情，就是叫做中国化。这种议
论，骤然看起来，好象非没有她的道理；然详细的去考察，
实在是一种很大的错误。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新的时代是要新的教育。中国既是要
在这新的时代过日子，中国就不能不提倡，而且不能不特别的
提倡新的教育。所以从中国目下的需要方面来看，中国之应
当新教育化，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至说新教育要合中
国的国情，我们首先就要问问，什么叫国情？国情这两个字，
虽可以包括一切的天然，气候，地理，物产，人种，
——以及文化的情况，然而事实上所指明的，却只能说是文
化一方面。我们承认天然，气候，地理，物产上的不同，固
然可以影响到教育的制度，然在文化进步的社会，这些东西的
影响，其实微乎其微。而且事实上中国的天然，气候，地理，
物产，和西洋文化先进的各国，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此外若
说中国人种的聪明和脑力，没有象西洋人这么高超，所以
说不到来模仿新教育，配不上来享受新教育，这是无论何人，
都会不承认的。

国情既是专指文化方面来说，教育又不外是文化的很多部
分当中的一部分。因为她是文化的一部分，或是一方面，
她不只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还受文化的支配。因此之
故，想对于教育上有相当和充分的了解，应当明白文化之对

于教育的关系，以及教育之受文化支配。

在文化没有或是很不发达的社会里，本没有所谓教育、政治、经济、宗教的分门别类。这些分门别类，是在文化较高的社会才有的。因为文化愈进步，则分工愈繁复。人们因为精神时间的有限，不得不把文化来分门别类，使能对于某一门，或一类上，能够专精。于是有的叫做教育，有的叫做政治，有的叫做宗教，经济等等，然文化本身上，并没有这样的分门别类。她是一种复杂的总体，而分开不来的。所谓分开，不外是我们对于事物认识上的一种主观作用。文化本身既不能分开，一方面的波动，必引起他方面的影响。因为了这个原故，新教育的中国化，或是中国教育的现代化，都和文化其他的方面，有了密切的关系。

固有的中国文化，是自成一个系统的，自成一个圈围的。所以固有的中国的教育，和固有的中国的文化，象政治，经济等，有了密切的关系。自东西文化接触以后，中国人感觉到事事样样都不如人，同时又不能闭关自守，而保存自己固有的文化，结果是固有的中国的国情，已不适合新的时代。整个文化既是不合现代的环境，则整个文化也要现代化了，何况文化之一部分的教育呢？若说中国的国情，或文化的某一部分，或好多部分，是合乎新时代，那么这一部分或好多部分，已变为现代的需要，而非中国的独有的，或固有的需要。在这种情形之下，也没有所谓新教育的中国化的可能，因为除了教育外，文化的其他方面，已经新了，那里有新教育的中国的国情化呢？

所谓新教育的中国化的前提，必定把现在目下的中国，当作还未达到现代化的地位。但是中国而若尚未达到现代化的地位，则今后的中国，愈要赶紧的现代化。同样，今后的

中国的教育，也当然要加紧的现代化。把新教育来中国化，又岂不是变成中国及中国的教育的现代化的历程中的大大的窒碍物吗？

我们以为所谓新教育中国化的最大错误，正是以为现在的中国的国情，还是中国的固有的国情。他们忘记了现在的中国，已和六十年前的中国，很不相同。现在的中国的国情，事实上也非中国的固有国情。而且这些国情，正是朝向着新时代化的途中。我们可以说，固有的中国的国情，不过是从旧的中国的国情，到新时代的中国的国情的过程中，逐渐的已成以及将成为过去的陈迹罢。

同时他们又必以为除了文化的教育一部分外，其他的部分象政治、经济等，还是依旧的不变。他们忘记了不但是教育，就是经济、政治等，也是趋向着现代化的历程中。要是教育家不愿努力来求教育的现代化，而反要使新的教育，来适合正在变换历程中的旧的政治，经济、或礼教等，以及这些东西所产出的结果，或是所传下来的遗毒，试问我们何不专心去保存旧的教育，以及文化的其他的方面，来维持我们的固有的国情，却要多生枝节的，去采纳新的教育，而致徒劳无益呢？若说因为除了教育以外的他方面的文化，已非固有的，所以教育也要变换来适合这一个国情，那么这一个国情，显明非中国固有的国情，而是现代化的国情。现代化的国情是现代的环境，并非中国所独有的，更非中国所固有的。这么一来，中国教育之要现代化，不但是理论上所必然的，而且是事实上所不免的。

三

平心来说，从数十年来的新教育史上看去，新教育并非完全没有成绩。她不过是进步太缓罢了。我们当然可以说，这

么迟慢的进步，是不能够适应我们的需要，而叫做失败。但是与其说这种失败，是由于新教育之不能完全和彻底中国化，还不如说是由于中国教育之不能完全和彻底的现代化。

我们已经说过，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教育的彻底现代化，当然是和全部文化的彻底现代化，有很密切的关系。关于全部文化的彻底现代化的问题，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单从教育的现代化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大胆的说一句，六十年来所谓教育现代化的运动，是陷于皮相浅薄的现代化的危险。而这种危险的主因，又不外是由于教育上的中国化的运动，——复古的运动。

中国之采纳新教育的制度，固不过是三十年左右的事情，然感觉到新教育的必要，却在六十年前。是一八七二年，第一批学生在容纯甫先生的指导之下，开始赴美留学。这一次所派的学生数目是三十人。到了一八七三，及一八七五，又继续遣派。然自一八七六年，陈兰彬被派为美国公使，吴子登为留学监督以后，留学生之命运，也因而中止。纯甫先生自传里说：

盖陈之为人，当未到美国以前，足迹不出国内一步。故于揣度物情，评衡事理，其心所依据为标准者，乃完全为中国之见解。……推彼之意想，必以为一己所受纯洁无瑕之中国教育，自经来美与外国教育接触，亦几为所污染。盖陈对于外国教育之观念，实存一极端鄙夷之思也。（《西学东渐记》页一二。一一一、二一）

陈兰彬之为人既如此，而吴子登更是冥顽固塞。结果正是象耶路大学校长朴德Porter一般所说，这般的中国留学生，还未受有相当的教育，而遣之回国，能不痛心？然则这一次所派的留学生之未能彻底西化，而仅拾其皮毛，可以概

见。

不但这样。这一群留学生之在美国，因为当局要使其不忘祖国的文化，于是特造一坚固壮丽的特别房子，来安置他们。他们除了在美国学校上课和特别情形之下，所谓读经文，谈天地，相交友，相习染，他们差不多可以说是象在中国一样。我们简直可以叫这地方做中国城。结果是一方面少有机会来审察西洋人的教育和生活的真精神，一方面因为和这般所谓头脑顽固，成见过深的官僚监督，朝夕相处，仇恨愈多，因此彻底西化的教育固没有法子去领受，还有中途遣回的悲剧。这一点错误，事前虽为纯甫先生所意料不到，然而事后却为他所承认的。

一直到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京以后——一九〇二年，中国始废八股，设学堂，和再遣派留学生。这一次的学生之赴外国者以到日本为最多。然其所学的，十九都是速成科。日本人为求满足中国学生的欲望起见，还且专替他们创设一所弘文学馆来容纳他们。里面连教授时，也有人翻译为中文。这也正是中国城。结果是大多数留日学生，不但是直接的西洋教育，没有法子享受，连间接的日本教育，也学不到家。因为他们对于必要的工具的日本文，还是十九不懂。

这种不彻底的外国化，固是由于学者只慕留外的虚名，然当时名为维新，实是守旧的政府及士人，乃是最大的阻碍。曾国藩，李鸿章的惟务机器教育，固不待说，象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尤为铸成大错的主因。

张氏的《劝学篇》，刊行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他本是当时一等名流，又被办理学务象张百熙一流人，称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的人。而且他的著作，又得上谕的奖励广布，一时传诵，无不奉为金科玉律。这本书分为内外两篇，

张氏说：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

从这种理论推衍下去，遂有所谓：

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较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莫过于此。

所谓“无悖经义”，“去华较近”，“易晓畏繁”，没有一件不表示根本上，他们是要沿旧蹈常。他们忘记了直接去仿效西洋，尚恐不能得到西洋教育的直谛，何况是从东洋间接学来？他们忘记了东洋人能够从西洋直接学来，中国人安有不能的道理？何况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信条，来提倡新教育，根本上已经不彻底，而事实上却是趋于复古。

从一九〇二年到欧战的时候，可以说是日本教育化最流行的时代。然事实上这班跑去日本留学的人自己对于西洋教育的研究，已不彻底，无怪乎尚不及日本教育化的中国，是没有多大的成绩。我们反观中国留学生的日本教师们，尚终年孜孜不倦的读西文书籍，以求直接得到西洋教育的真诠。中国好多留日学生，西文不读，尚有可恕，连日文也不愿读，相形见绌，并非无因。

十余年来，大家都以为中国的教育是美国化。我们以为设使中国的教育而是认认真真的美国化了，那么中国的教育，断不会糟到这么田地。其实，一个人若到美国读了十余年书，恐怕未必就能和美国人并驾齐驱。要把全国的教育，于十年间，做彻底的美国化，或是任那一国化，恐怕是绝对不能实现的事。何况国人十余年来教育上的复古趋势，层

出不穷，数见不鲜呢？

欧战以后，国人见得欧洲满目疮痍，于是大提倡其东方精神文化。教育——我们已说过——是受文化支配的，而又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提倡精神文化的人，对于西洋教育之彻底采纳，当然存着怀疑态度，所以最近如邹海滨陈果夫等的提倡停办文科法科，专事发展职业教育，无非表示我们之对于现代化的不彻底。我们试想，文科法科及无论那科，才在萌芽的时期，就要停办，而专提倡职业教育，又岂非跑回曾国藩李鸿章们那条路吗？

四

我们的见解是：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彻底的现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现代化，而且要彻底的现代化。职业教育固是要如此，普通教育也是要如此。低级教育固是要如此，高等教育也是要如此。城市教育固是要如此，农村教育也是要如此。惟有现代化的教育，才能叫做活的教育。惟有现代化的教育，才能叫做生的教育。惟有现代化的教育，才能叫做新的教育。中国人而不要新生活的教育，也算罢了，要是要了，那么只有赶紧的，认真的，彻底的现代化。然而要达到这个地步，首先就要放弃和推翻这种似是而非，而最易迎合一般中国人心理，而有开倒车的危险的言论。

这篇文字，是去年写的。但是一路搁置到今，没有发表。近来读《独立评论》陆续登载徐旭生先生的《教育罪言》，及蒋廷黻先生译陶因的《中国的政治》诸文，很觉得高兴和同情。然而最近读到第三十八号所载旭生先生的《教育罪言》的结论，和蒋译陶因的《中国的教育》的见解，却生出很大的失望，因而决意把这篇文来发表。我的思想就是假使中国教育